

## 序 PREFACE

周星

2008年暑假前夕，赵玉燕博士来了几封电子邮件，并发来了她这部大作的电子版文稿，希望我为它写一序文。《但感·旅游与文化再生产——湘西山江苗族的开放历程》既是一部研究苗族文化的学术专著，也是一篇以旅游人类学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它是在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指导下完成的，按说应由导师写序才妥，但高丙中教授也有意让我来写，大概是因为我以前曾较为关注过苗族以及旅游人类学有关问题的缘故吧。对我而言，倒也是又一个学习和思考的机会。平日琐事缠身，案头也总是文债如山，但能在暑期里忙里偷闲，潜心拜读一位新锐人类学学者的博士论文，用心把读后感写出来，以资和作者及诸位读者交流，确也是一件愉快的事儿。

赵玉燕博士到北京大学求学时，我已离开了那里，和她不熟，故不必无原则地为熟人美言。这些年我注意到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博士论文的水准逐年都有提高，特别是基于扎实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民族志得到较多重视，同时，博士生们的学术视野也越来越开阔，不仅有较好的人类学专业的理论修养，也有直面中国现当代诸多社会与文化问题的实践性的勇气。赵玉燕博士的这部著作，在我看来也具有上述特点。

作为一部民族志作品，本书颇为详尽地描述了湘西州一个苗族山寨社区的日常生活世界，文字细腻、从容，读来很流畅。在民族志叙述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展开专题性的讨论，亦即在全球化背景下之“旅游场域”中苗族文化传统的维系、复兴、变迁及其再生产的过程和机制等

问题。从一个微观基层社区的诸多文化动态，本书试图探讨苗族乡土社会从相对封闭而逐渐走向开放格局的艰难历程。我很同意作者的这样一个论断：一个边远苗族社区所经验的种种心路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和整个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对外部世界和全球化大潮汹涌之时的心态历程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或者说是一种“同构”性的关系。因此，本专著的研究也可被看做是能够映照中国社会这一种总体进程的少数民族个案。也就是说，本书的结论至少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俱有一些普世性意义的。

对于苗族社会及文化的理解，本书没有停留在日常生活世界和物质表象层面，而是基于对边区苗族社会之封闭格局的形成历史（与朝廷及外部汉区的长期对峙、冲突等）所进行的较为完整的梳理，同时也是基于对山江苗寨民众的历史记忆、社会结构、诸物质设施、涉及其信仰和精神世界的三、盘、鬼、命等若干理念的较为全面的综合性考察。赵玉燕博士谨慎而又不乏创见地提出了“惧感”这一概念。她倾向于认为，此种对于“外人”和“外鬼”保持高度不信任、拒斥和疑虑的“惧感”意识，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当地苗族的“惯习”、行为模式和颇为稳定的族群心理状态，并成为其民族精神气质或性情倾向的一部分。在有形、无形的边墙封锁和高压隔离之下，苗族民众产生此类防范、戒备、焦虑、疑惧的性情倾向，并不难理解，因为“惧感”就如同一种社会化了的客观性，它在促成了高度危机感的同时，也有利于他们保持内聚、自治和尊严。作者指出，作为一种固化了的应对外部压力和艰难人生的文化样式或机制，“惧感”的内涵既包括了有形的寨门、屏障和迷宫般的村寨设防等，也包括了习武、尚武、合款、习惯法、社区人际关系的彼此高度依赖以及对于巫蛊的指认、对于鬼和命的笃信等无形的部分。

赵玉燕博士对于“惧感”文化的归纳和表述，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较早时期文化人类学的“文化与人格学派”。该派的或受其影响的一些人类学家在对某些异文化进行描述时，很重视其族群的心理气质、民族性格或某些特定的文化价值取向。例如，有人把气质温和的说成是“太阳神”型的文化，把具有极端或偏激倾向的说成是“酒神”型的文化；或把某文化说成是“罪感”的，而把另一文化说成是“耻感”的等等。

我想，“惧感”作为本书的关键词之一，大概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吧。尽管“文化与人格学派”的方法论后来曾遭致到不少的批评和质疑，但由于作者已对她所描述的“惧感”给予了历史文脉背景和族际关系格局等多方面的阐释，同时，她还通过很多实证性的资料和案例对于所谓“惧感”的内涵有所论证，因此，我觉得，如果对其不做绝对化和扩大化解释的话，关于“惧感”的归纳还是具有新意和能够被理解的。“惧感”概念的提出，反映了作者的苗族文化研究已经试图超越日常生活的层面、物质文化和制度的层面而深化至其精神特质、性情或心理世界之层面的最新努力。本书的贡献之一，正在于探讨了包括此种“惧感”在内的苗族乡土文化在一个开放的旅游场域中，是如何发生变迁和得以再生产的，读者可以看到诸多涉及“惧感”的仪式、言说乃至物质的载体在旅游场景中反复出现，并最终完成了作者所指称的“惧感”的舞台化再生产。

我以前在研究贵州省黔东南州一个苗族旅游村寨的“文化展示”问题时，曾经注意到在开展旅游接待活动的村寨里，苗族乡民会比较自然地把自己的文化区分为可以向外界展示、演出的部分和尽量不希望游客随意进入的部分。这种情形在本书中被更为恰切地表述为苗族社区内部当地民众自身的“生活文化”和面对游客展示、演出的“展演文化”。尽管此种区分多少意味着旅游目的地文化分裂，但基于游客的文化消费需求，也就总是会有某些文化要素被筛选出来，除用于展演和展示外，也被用来在其日常生活和展演、展示或旅游接待之间形成某种区隔，以便继续维持社区内的文化秩序。赵玉燕博士和我都倾向于认为，旅游是一种典型的具有现代性和全球化背景的文化产业，它试图消费的文化对象经常是在实践中被分化成为展演、展示的和维系日常生活的两大部分。我们也都相信，在旅游场景下实际是存在着一个文化展示的逻辑，它同时也是导致旅游目的地发生文化变迁的最为重要的路径。不过，赵玉燕博士进一步认为，旅游场景的文化展示往往还可以展现出当地人的“自我意象”，这则是我以前较少考虑，感受到启发的。

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已经揭示出，旅游目的地社区最常发生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主要有文化冲击、社会分化、文化复兴、文化商品化、自豪感以及排外情绪等多种途径与形式。赵玉燕博士在她的这部专著中，详细

说明了苗族山寨的独特文化是如何被视为一种文化资本，进而又是如何被组合开发成为旅游者的大众消费对象，亦即文化之地方性（湘西风情）或族群性（苗族风情）的重新创出。在这个“野蛮而优雅”的湘西苗寨，游客的文化消费欲求得到了迎合和引导，与此同时，当地文化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动态。首先是物质和器物层面，诸如民居、手工艺品、器皿、民族服装、银饰、传统饮食等，很容易直接被商品化。其中有些逐渐式微的，像刺绣、蜡染、扎染、木雕、编织、剪纸等传统工艺，也很容易借助旅游市场而获得复兴。其次是待客方式像拦门酒等，歌舞艺术如苗家花鼓等，还有诸多节庆活动中的仪式等，也都可以程度不等地成为文化展示的重要内容；而在展示、展演过程中，往往难免出现某些乡土传统或民俗被破坏、混同、拼接、重构以及夸张的舞台化等趋向。更为重要的是，赵玉燕博士还通过对一家苗族博物馆的全面考察，揭示了苗族知识精英们的“文化自觉”以及他们试图重塑民族自我形象，并试图重新阐述和解说地域、族群乃至国家历史的各种努力。

将“惧感”包括进文化再生产的对象范畴之内，这是很让我钦佩的卓识胆见。在我以前的印象中，类似“巫蛊”、“走尸”之类的神秘文化，很可能属于社区内部隐晦不言、不愿被外人他者知晓或轻易不会展示给游客的内容，它们更有可能依照其内部文化的逻辑维系原状或在失去了相关的社会基础后逐渐走向式微。但现在，赵玉燕博士的研究表明，反倒是这些神秘文化的“神秘性”因其独特而更易成为旅游文化市场上的卖点（旅游吸引物），它们同样也有可能是在旅游场域的文化展演中出现，也同样有可能在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中被变形、重构，被再发现和再定义。简单地说，这就是一个从“惧感”到“神秘感”的再生产过程。曾经是令人深感不安和恐惧的巫蛊世界，包括傩堂、还傩愿之类的神秘仪式以及上刀山、下火海、踩火犁、摸油锅、吃火炭之类的秘传绝技，现在则被重新解说或塑造成为神秘和浪漫（蛊毒）的文化，以迎合游客的猎奇心理；曾经是族际冲突与隔阂交通的边墙屏障，现在则化身成为中国南方的“长城”。旨在演绎“神秘性”的各种仪式，在为游客展演的过程中日趋简化，其娱神、通神的属性，亦即神圣性逐渐衰减，而世俗性、娱乐性和表演性却在不断增加。此类仪式的舞台化演绎，大

多都被剥离于原先的社会背景和语境文脉，仅成为展示族群独特性的素材和方式，甚至成为旅游社区新的娱乐展演文化的主要内容。

赵玉燕博士所强调的以排外自保为基本特征的“惧感”文化机制，是苗族社区在过去数百年间甚至更长的历史过程或经验当中形成的。反复不断的族际冲突，“民”与“苗”的对峙，“生苗”与“熟苗”的分化，朝廷的持续性征剿、压迫和甚至以边墙未固化的“生苗”边界，当然还有文化上的歧视和同化等等，依据所有这些“负”的历史遗产所建构起来的“惧感”文化机制，既有迫不得已的缘由（抵抗和阻吓外部世界的侵略），也有主动的自我疏离（内向自保）。终于在大约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苗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惧感”这种“惯习”也自然发生着改变，开始融冰且加速解冻。现在，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当代苗族社会的主旋律之一，本书作者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导致开放的诸多路径，而发展旅游正是边区山地苗寨所新近经历的又一种途径。在这最新一轮的开放进程中，以苗族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族精英较为先行的“文化自觉”，固然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一般苗族民众的实践性参与，更是其重塑族群形象，凝聚文化认同，促成文化之自觉和复兴的最为基本的动力。

在完全的闭关自守不再可能的时代大背景下，“惧感”的文化内涵和机制，一方面确实是在逐渐地衰变之中，但另一方面它又以其他的形式被再次生产出来。我们看到，以疏离、疑惧为特征的“惧感”文化机制，似乎并没有伴随着苗族社区的开放和新时代的到来而立刻和完全消解，其表达方式的一部分仍然以自身的文化逻辑自在地延续、承袭着，并由此维系着族际的边际分野；与此同时，其另一部分表达方式则被卷入到文化展演的旅游文化逻辑之中，从而扩展了“惧感”文化的新外延。

赵玉燕博士在本书中使用了很多来自欧美的学术概念，包括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实践”、“惯习”和“资本”等，此外还有“文化再生产”、文化的“本真性”等，她努力使这些概念能够活用于对象社区的具体情形，并致力于发展或引申出一些新的概念，例如，从“场域”发展而来“旅游场域”概念，还有“惧感”的提出和界定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在理论方面勇于探索的姿态。但我觉得，

赵玉燕博士通过她的研究揭示给我们的是：边区苗寨的旅游开发所带来的不只是物质文化层面的现代化变迁，更重要的还有族群整体心态的积极性转换，亦即苗区民众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的心路历程。这是我拜读本书所获诸多启示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

上述文字仅是个人的一点感想，愿以此为序，希望向大家请教。

2008.08.06

写毕于北京寓所

## 中文摘要

本专著是一部以叙事为主干的民族志，主要叙述一个边远苗族社区从相对封闭走向全面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围绕着惧感进行的文化再生产，意在展示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基层微观社区的文化动态。作者以对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西北部的山江苗寨十个月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参照该苗寨进行旅游开发而建的苗族博物馆和周边苗寨旅游开发考察苗区内部的原生文化与展演文化，把该地苗族人对惧感的表达作为研究分析的核心内容，着重描述和分析了该苗区传统的巫蛊之风和它们在当下兴盛的旅游背景下的变化。

文本的描述和分析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1) 山江苗族明清以来的历史记忆、日常生活、社会结构和巫蛊世界；(2) 山江旅游的发展、苗族在旅游场域中的参与。之后，作者展开了文化再生产、文化复兴与文化商品化的讨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近三百年里，处于腊尔山台地的山江苗族逐渐具有较强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主要来自于外界压力：(1) 地理居住环境。人们居住在武陵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村寨之间交通不便，与外界信息隔绝。(2) 与朝廷的冲突。明清时期朝廷开边拓土，在不断“征剿”、“蚕食”被称为“红苗老巢”的腊尔山台地不利的情况下，修筑“边墙”将“千里苗疆”的“生苗”（包括山江苗族）与外界隔离。“边墙”上的碉堡、哨卡，成了将“生苗”囿限于腊尔山台地的一道屏障。(3) 社会动

荡。民国时期山江苗区匪患横行,人们只能排外自保以求生存。为了应对来自外界的凶险,山江苗族生产出主动封闭自我的一套惧感文化机制。它主要体现在:(1)社区内巫蛊之风和信命的繁盛;(2)建筑上的门楼、寨门、路障的修建和布局;(3)心理上对外界的几近于病态的“惧感”以及由此导致的行为模式。社区内部对蛊婆的指认和各种各样的驱鬼仪式尤其集中地体现了山江苗族以“惧感”为基点的封闭性,它强调人们对外界的疏离。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山江苗族与大社会隔离的局面被打破,山江苗族从自己不同的人文时间和空间中走出,逐步与外界同一步调。山江苗族与大社会的接触,主要有以下途径:(1)现代传播媒体(广播、电视、收音机、电话、手机、影碟机和因特网)逐步进入山江苗区,部分媒体深入到山江苗族的日常生活当中。时空的分隔被打破,山江苗族拥有了与外界相似的“文化想象”。(2)山江苗族大批年轻人跨越心理和地理的边界到周边的城市和沿海城市打工,对外界了解增多。(3)2001年底,与山江只有18公里之遥的凤凰古城被国家审批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不久,凤凰县开始进入“全民发展旅游”阶段,纷至沓来的游客使山江苗族的封闭自保完全成为不可能。在发展致富的期盼下,山江苗族投入旅游开发的热潮中,并取得了一定成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山江苗族的开放历程,正在经历着一个“走出去、请进来”的过程,其中现代传播媒体、世界文学大师苗族作家沈从文的湘西书写以及发展旅游的外部语境透过山江苗族对自我的认知而发生具体作用。

山江苗族在建立私营苗族博物馆,自发进行苗族村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有效地利用了各种媒体对外界进行诸如话语、实物、仪式等方面的宣传。当地的花鼓舞、传统服饰、惧感文化等都被当作文化资源得以展示。在这种文化再生产的过程当中,山江苗族的显明精神特质——惧感的文化表达如巫、蛊、命的一部分,一改过去在社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如疏离内部、吓唬外界以及解释规因等,在旅游背景下被抽离出来,成为一种展示民族独特性和社区开放的娱乐文化。巫术绝技和各种可

言说的神秘文化成为旅游吸引物的一部分。笔者认为,社区中的人作为能动主体,运用了社区内生的文化资源再生产出一种展演文化,它反映出苗族社区内部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在不同的语境中发生的变化。

结论指出:(1)在社会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由于旅游切入社区导致了文化再生产方式的转变,人们内部的异质性增强。作为山江苗族典型心理特点的惧感,其表达方式一部分仍然以自在的方式在传承,另一部分则被抽取出来向游客展演,从而完成了其自身的舞台化。(2)山江苗区由相对封闭状态走向开放的核心表现是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和作为旅游设施的博物馆与苗族风情园的建立,这个过程是山江苗族通过外出打工和现代媒体的宣传,对国家政策、现实环境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以及凤凰古城旅游的发展促成的。(3)在旅游开发和文化展演的行动中,山江苗族的心态整体上由封闭走向开放,这个心路转换过程与整个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面对外界所经历的心态历程有相似和相通的方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本专著可以被当作映照中国这一历程的个案研究。

## Abstract

This ethnography narrates mainly the cultural reproduction around the expression of the feeling of fear in the course from a closed society to an open society of the remote Miao community of Shanjiang in the north-western part of Fenghuang county in Xiangxi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Hunan Province. On basis of the data from ten-month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Shanjiang, the author makes a profound research on the original culture and the expressed culture there since the author aims at depicting and making analysis of the witchcraft and its change in the background of tourism. Essentially, the author is interested in the various expression of fear of Miao people in the past and at present in Shanjiang.

The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ext develop in two aspects: (1) the history and memory, the current ordinary life,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world of witchcraft of the Miao people in Shanjiang; (2)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Shanjiang community. Then, the author explores a discussion on cultural reproduction, cultural rejuvenation and cultural commercialization.

In the recent three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found of P.R.C, Miao people in Shanjiang gradually became conservative and exclusive in order to fight against the dangerous outside environment: (1) the living condition full of risks. People inhabit in mountainous area with poor communication network; (2) The conflict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 suppress the rebellion of Miao people in La'ershan tableland

(Shanjiang situates on the edge of La'ershan tableland),the imperial court build a stone wall ("Frontier Wall") with pillbox and strategic sentry post on it to block the movement of Miao people thus to separate them from the outside world;(3)the turbulence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1912—1949) since the banditry was rife there. To survive and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harm, Miao people managed to produce a set of cultural mechanism of fear, which expressed mainl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1) Miao People's belief in witchcraft and Ming;(2)The building style of the village gate, the arch over the gateway and the barricades in the village;(3)Psychologically, people feels great horror to the outside world thus to formulate a peculiar kind of action mode. Especially, the suspicion of woman with "Gu" who is said to have the power to discomfort others or even kill her neighbors and the various ceremonies of driving ghosts in the community expressed concretely the fear of Miao people in Shanjiang area. This society puts emphasis on keeping itself apart from the outsiders and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procedure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a, the situation of Shanjiang's isolation from the big outside society changed, the Miao people there began to have more knowledge about the outsiders because of three factors:(1)the spread use of mass media in their ordinary life;(2) many young people swarm out to earn a life in big cities nearby and citie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China;(3)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Fenghuang county which exerts a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all of them in the community. After a short time of hesitation, people of Shanjiang began to develop tourism themselves and made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We may draw a conclusion from above that the course of openness to outside of Shanjiang is experiencing "going out and inviting others in",and the mass media, the works of the writer Shen Congwen of Miao ethnic group and the tourism context produce a great impact only through the Miao people's cognition to themselves.

During the course of Miao people in Shanjiang setting up the Miao Museum and exploring the small village of Banku to be tourism sights, they made use of the mass media effectively to raise their fame as

interesting places to the tourists. Miao people there describe themselves as mysterious and hospitable. Cultural resources as drum-dance, traditional costume and the fear culture are all displayed. Here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in this kind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one part of the witchcraft is being drawn out, and also great changes took place in its meaning and function. Originally, witchcraft such as Gu aimed at separating the inner and outsider through creating the feeling of fear, explaining something unusual and the health trouble in short time, yet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it changed to be part of entertainment culture. Performances of magic rites in driving-ghost ceremonies now turn out to be attractive matters showing the uniqueness of Miao ethnic group. The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themselves become cultural agents and create a new kind of culture—expressed culture (or we may say, tourism culture), which reflects the changes of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e author points out in conclusion that: (1)with the chang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especially after the entrance of tourism to the Miao community of Shanjiang, people there begin to have different voices and behaviors. The fear and its expressions, once being the typic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of people there, have split up to two parts—one part still exists as it was before, another part becomes an expressed culture in the stage;(2) The establishment of Miao museum and exploration of Banku village express the community's openness to the outside world, which facilitates from the mass media, a good knowledge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outside and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the nearby Fenghuang city;(3)In the procedure of exploring tourism and displaying culture, the mentality of Miao people in Shanjiang is in an open mood instead of a closed mood. This transformation of mentality is somewhat similar to that of the whole Chinese in the recent hundreds of years confronting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us in a certain degree, we may regard this ethnography as a case study to this course of China.

## 目 录 CONTENTS

中文摘要.....001

Abstract.....004

导 论.....001

一、问题的提出 / 002

二、理论框架与相关研究 / 010

三、研究框架与结构安排 / 020

第一章 山江苗族的历史与记忆.....025

一、中央封建王朝与武陵山湘西苗寨 / 026

二、边墙始建与乾嘉苗民起义 / 030

三、边墙复修与屯防制度 / 035

四、湘西光复运动、革屯运动和匪患 / 040

五、山江苗族的记忆与认同 / 043

第二章 山江苗族的日常生活世界.....051

一、民居与山江概况 / 052

二、山江苗族的服饰、饮食与经济活动 / 060

三、山江苗族的生活节奏 / 066

四、山江苗族的民族节庆体系 / 071

### 第三章 山江苗族的社会结构.....075

- 一、山江苗族的家与屋宅 / 076
- 二、山江苗族的婚姻与家庭内部关系 / 085
- 三、村寨内部关系 / 100
- 四、寨子之间的关系 / 106

### 第四章 山江苗族的巫蛊世界与惧感.....113

- 一、巫蛊及其研究 / 114
- 二、山江苗族的“蛊”观念 / 118
- 三、山江苗族的“鬼”意识 / 129
- 四、山江苗族的“命”观念 / 135
- 五、山江苗族的惯例——惧感 / 161

### 第五章 山江苗区的旅游与惧感的文化再生产.....163

- 一、山江苗区旅游场域的产生 / 170
- 二、山江苗族在旅游场域中的参与 / 176
- 三、日常展示、文化复兴与文化商品化 / 186
- 四、惧感的文化再生产 / 196

结语.....205

主要参考文献.....210

后 记.....217

## 导 论

### FEAR, Tourism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 Opening Course of the Miao People in Shunjiang, Western Hunan

发展旅游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与舞台展演及心态变化是作者想通过这一民族志文本来了解的。湘西凤凰山江苗族地区被笔者选为田野调查点既出于偶然也属必然。笔者通过山江博物馆的馆长玉伯了解博物馆并进驻苗寨,完成了10个月的田野调查。在民族志文本写作时,作者使用的概念工具有文化再生产、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并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现状进行讨论,提出“旅游文化”这一概念。

## 一、问题的提出

### (一) 调查的缘起

在现代化语境下，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似乎都找到了一种后发优势：大力发展民族文化旅游，将旅游产业作为地域振兴和民族复兴的一个重要发展点。民族文化的资本化，严格来说是商品化，一时成为社会各界、学者和政府关注的中心。那么，在这些发展旅游的少数民族地区，它的真实状况如何？当地的少数民族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和抽离自己传统文化中的要素作为向游客进行舞台展演的资本的？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与舞台展演有何区别？更重要的是，面对历史与现实，他们正在经历一个怎样的心态变化过程？具体地说，对于一个曾经较为封闭的社区而言，它如何通过旅游从封闭走向开放？游客和东道主、旅游开发商、政府和其他各种力量之间达成怎样一种社会互动，从而实现了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再生产？一个民族志文本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切。

抱着这个想法，我选择了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的山江苗寨作为我的田野调查地点。

由北京出发，乘坐由北京西开往怀化的列车，25个小时后便可到达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首府吉首市。由吉首搭旅游巴士南行，一个小时便可到达风

> 凤凰在湖南的位置示意图



凰县城，之后再搭乘人货两运的小货车或者公共汽车往西北方向行驶，半小时后就可到达山江镇镇政府所在地黄茅坪苗寨，村级公路再通向山江所辖的其他苗寨。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于1957年，是在1952年建立的湘西苗族自治区的基础上改名的。现辖吉首、凤凰、花垣、古丈、泸溪、保靖、永顺、龙山等七县一市。这一地区历史上曾长期是苗族人民活动的中心，至今仍居住着近百万操苗语东部方言的苗族人。

凤凰县地处湖南西部边缘武陵山下，沅江流域西部，云贵高原台地东端，总面积1759平方公里，辖31个乡镇，344个行政村。全县总人口38万人，由苗、汉、土家等18个民族组成，其中苗族人口19.8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54%。凤凰县经济相对落后，一直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2001年，凤凰古城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凤凰县因而赢得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旅游成为其重要产业。<sup>①</sup>

山江镇地处凤凰县西北部，距离县城20公里，南北长12.3公里，东西宽10.9公里，总面积75.5平方公里，平均海拔500多米，西邻贵州松桃，有县内公路风麻、凤腊两条公路贯穿该镇。山江镇下辖15个村，1个居委会，49个村民小组，39个自然村寨，共有农户2652户，人口13252人，苗族人口占99.4%，是一个典型的苗族聚居区。山江位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为16.5℃，夏季月平均气温为29.8℃，冬季月平均气温为1℃，年平均降雨量为1270mm。该地属喀斯特溶洞地形，森林覆盖率为75%以上，具有较好的森林风景。主要树种为松、杉、竹、柏等。<sup>②</sup>

山江作为一个苗族聚居区，有它历史上的独特之处。山江地处腊尔山台地，自古就是苗族的聚居点，这里的苗族在典籍上被称为“生苗”，一直不被土司或流官治理，政治经济自成一体，同时坚守着自身的文化传统。明清以来，帝国政权对这一块被称之为“红苗老巢”的生苗地征剿不成，就反复利用“卫所制”和“土司制”进行封锁和防范。在大军的征剿和土司、卫所的防范失败以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明廷采纳辰沅兵备参政蔡复一的献策，拨“帑金”四万多两，修筑了一条从铜仁亭子关起到镇溪所长约三百多里的“边墙”，进行军事封锁。明清以来，时存时续的“边墙”上的关卡和碉堡，从地理上把包括山江苗民在

①据《凤凰县工作情况汇报》（中共凤凰县委 凤凰县人民政府，2005年11月7日）的工作报告：2004年凤凰县生产总值突破12亿元，财政收入7296万元，是五十年来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一年。2005年1-8月，全县实现生产总值8.977亿元，增幅达9%，经济发展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  
②材料来源：《山江镇政府工作汇报》，2005年8月10日。